

从严治党关键在制度治党

——读邓小平的《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王瑾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人员时作了重要讲话，核心内容即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邓小平在文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并就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从干部能上能下、监督、交流和教育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不仅敏锐地抓住了干部队伍建设这个管党治党的关键问题，而且抓住了关键问题中的四个核心内容。虽然50多年已经过去，但今天重温《执政党的干部问题》这篇光辉文献，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如何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依然具有重要启示。

“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

如何打破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怪圈，是干部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他认为，要推动能上能下，思想上弄通是前提，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为了更易于干部接受，干部职位下调后，可以保留原薪原级，也就是说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不降低。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能下至少有两好处：一是职位下调的干部在基层可以起到传帮带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比如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这是对干部的一种锻炼。二是有利于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指出，当了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很不利于发扬民主。如果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普通党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时，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

当前，干部能上不能下依然是制约干部任用的制度性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根据这一重要精神，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将干部“能上能下”作为一个重要的导向和目标。邓小平关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思想，为解决干部“不到退休下不来”“不犯错误下不来”等难题提供了良方，对探索完善干部“能下”机制、建立干部正常更替机制具有重要启发。

加强“党的生活的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如何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强调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在讲话中提及五种监督方式：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党

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和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特别强调了“党的生活的监督”。

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指出：“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每个党员都要过支部和小组生活，而领导干部不仅要过支部生活，也要过党委和党组的生活，接受党支部和党委的监督，即双重组织生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对领导干部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领导干部在党委会内互相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这样的监督效果更好。众所周知，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重要会议。邓小平提出党内监督问题，是从惨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时隔不到一年，他再次强调党内监督的问题，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邓小平所说的“党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指党内政治生活。他在这里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监督教育干部作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基础，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指出“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温邓小平关于“党的生活的监督”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

组织干部交流，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优良传统。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把定期交流干部制度化。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干部交流的重要性，认为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而是交流一下大有好处。实行干部交流，一方面，可以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邓小平指出，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换个环境，能让干部接触新语言，开阔新视野，丰富新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优化班子结构，实现干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干部调换岗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班子合力，提高整个组织的战斗力。因为有些时候，“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

干部交流有利于激活一池春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新时代加强干部交流，形成中央和地方干部、机关干部和基层一线干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干部之间的交流锻炼，对于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致力于干部教育工作，认为“干部教育工作应当抓紧”。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尤其注重干部教育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提出党员干部要注意学习，否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干部要加强学习，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

加强干部学习，离不开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党校要发挥短期轮训和长期教育两方面的作用：“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对于轮训学习应坚持的原则问题，邓小平作了着重阐述。为了能让干部在轮训讨论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邓小平强调轮训要坚持“三不原则”，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三不原则”，即1961年颁发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提出的“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重温邓小平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能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越是目标远大、任务艰巨，越是挑战频仍、矛盾集中，全党越要牢记“能力不足的危机”，越要有一种勤于学习的空气、一种追求进步的空气、一种不断完善自我的空气。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执政党的干部问题》，对于深入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好用好管党治党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重读经典

恽代英：学以致用 身体力行

□焦丽萍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教育家、理论家和青年运动的领袖。他一生留下了近300万字的著述，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些思想既是他严谨治学、学以致用的真实记录，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治学经验的积累和实际应用。他对读书治学的目的、作用、方法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博览群书，笔耕不辍

恽代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他读书非常勤奋，从小时候起，为了看完一本书而废寝忘食是经常的事情。1913年，18岁的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的预科后，更是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书籍，他想方设法找各种图书资料来阅读，并且通过订阅、借阅和购买等方式不断拓展阅读的数量和范围。他在校学习的五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年代，通过广泛涉猎，恽代英在寻求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真理的过程中，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恽代英仅有两段在校学习的经历，他的渊博学识是通过自学得来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少有的、懂得三种外语的人才，除英语经过他人简单辅导外，日语和德语都是自学而成。他对坚持自学有着深刻的体认，并总结了自学的四大好处寄语青年人：“一可以增加学生注意力；二引起其疑问之习惯；三养成无师自习之习惯；四便于个别指导。”他特别强调思考对于读书的重要意义，认为在看书的时候下一番综合整理的功夫，才能使书中所说的能成为自己的学问。正是通过自学并伴以读书时的思考，恽代英在许多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恽代英很博学，但又不是仅仅埋头在书斋里看书，而是关心国家大事并诉诸文字将他的思想表达出来。大学第二年，他发表处女作《义务论》，随后发表了



《新无神论》《怀疑论》《文明与道德》等论文。1920年10月发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译文。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学期间，他在《光华学报》《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共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1923年到1927年间，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130多篇。他的文章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与战斗力，批判国家主义派、新老国民党右派的论著常使他的论敌十分敬畏，同时这些文章又在进步青年中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恽代英反对无目的的“书痴”式、“业儒”式的读书，倡导读书“不要忘了社会的实际生活，社会的实际改造应用”。在他看来，读书的致用就是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就是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现实道路。不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教育实践和革命工作中，恽代英始终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求学要考虑社会的需求，要把学问用在服务社会上，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积极创办社团和刊物。1917年10月，恽代英发起并创建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9至1921年期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义。恽代英创办或主编了不同类型的报刊，利用这种舆论平台批驳各种错误观点，积极宣传救国救民和民主科学思想，鼓舞社会士气。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时期起，他参与创办、编辑的刊物多达十几种，他站在文化阵地的最前线，用文章解答民众思想上的困惑，引导他们投身革命，为革命引入了大量优秀人才。

讲学和编写教材。恽代英曾到李富春任班主任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主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五卅”运动》，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史概要》，在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期间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还编写了《政治讲演大纲》《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等讲义。他的课说理透彻，鼓动性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他的信仰传播给更广大的民众，用他的知识服务社会。

治学、修身和爱国的统一

恽代英明确的治学态度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是读书思考的必然结果，他把治学、修身和爱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机地统一起来。

他非常重视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因为它是善势力的发源地”，而读书是“修养思想之方”。他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始终践行这一良方，通过日记记录

自己每日所作所为，反思自己的言行，剖析自己的思想，达到自我修养、自我提高的目的。他理想远大，提倡“力行”，指出救国不在空谈，贵在力行，“吾意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对于革命事业慨然担当，始终如一正是他的道德选择。

恽代英在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泛社会主义思潮中，经过探索和实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就从未动摇过。他一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实践。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习重点和方法论基础，他对中国社会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前途都有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思想。

恽代英从事过不同类型的教育工作，他用雄辩的口才、生动的文章、热烈的激情和高尚的人格，不断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感、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一以贯之地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他自己身在身陷囹圄时，仍然以爱国主义热情写就了《忆中诗》：“浪迹江湖数日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抵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既缅怀战友，又表达了自己意志弥坚的决心，最终他用牺牲证成了他的爱国信仰。



文化自信的理性思辨与实践探索

——《文化自信八讲》简评

□高玉敏



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高宏存教授担纲主编的《文化自信八讲》，荣获了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精品教材奖”，成为获此殊荣的13部书之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自信决定着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因此在当下研究文化自信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价值。《文化自信八讲》站在国家均衡对称崛起的战略视野，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最终竞争力的高度，深入思考一个文明型国家走向复兴的文化路径与世界贡献。该书凸显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回应时代热点。当前中国正

以崛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使中国崛起缺少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长期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众普遍缺少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均衡崛起的“文化瓶颈”。那么如何突破瓶颈，解决中国的不对称崛起之困？如何续写中华文明新的辉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文化自信上升为决定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文化自信八讲》一书正是站在时代前沿，积极回应时代和人民需要，带着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的深入思考去萃取文化自信的理论精华。作者精心选取了“经济发展之后中国要干什么？”“文化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信的核心与实践”等当代中国主题来诠释文化自信问题，这就抓住了时代脉搏，发挥了导向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研究视角独特。从内在逻辑看，《文化自信八讲》以时间为轴，清晰地展示了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与“来世”。著者

以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为切入点，在历史的回望中，用精炼的语言、典型的案例阐释中华文化何以从“自信从容”走向了“文化自卑”，又如何开始了“文化觉醒”，以及为什么提出“文化自信”的时代课题，丝丝相扣，引人入胜。文化自信的“今生”用墨最多，作者以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价值观自信、文化强国等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点，分章节全方位探讨文化自信基本问题。每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共同展现文化自信的不同侧面，使读者对文化自信的认识是立体、多角度的。尾章“文化自信的疆域拓展”站在全球高度，展望了文化自信的“来世”，探讨中华文化何以能够、又如何为全球治理作出中国贡献。从“前世今生”到“未来”这一独特研究视角全面深化了对文化自信本质的理解，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营养。

立体化路径构建。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以及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立足传统、不忘本来，开放包容、吸收外来，超越发展、面向

未来。《文化自信八讲》正是以这样一种既开放又包容的视野，在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中，对实现文化自信的路径进行了立体构建。不忘本来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理论奠基，在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坚定文化自信。吸收外来就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在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面向未来就是要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把握中华文化发展前景，在续写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中坚定文化自信。如此既立足传统，分析当下，又作未来构建，传承、开放、超越，完成了对文化自信实现路径的立体构建。

总之，《文化自信八讲》对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深刻内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著者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学术与大众兼顾，铺陈及比兴同行，读来能引发共鸣，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中华文化本质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坚定文化自信，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贡献。

